

客家与民俗研究丛书

主编：林晓平 万建中

民间年画的技艺表现与民俗志书写 ——以朱仙镇为调查点

万建中 / 等著

中国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客家与民俗研究丛书

主编：林晓平 万建中

民间年画的技艺表现与民俗志书写

——以朱仙镇为调查点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民间年画的技艺表现与民俗志书写：以朱仙镇为调查点 / 万建中等著。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10

(客家与民俗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161 - 7164 - 6

I. ①民… II. ①万… III. ①年画 - 研究 - 开封市 IV. ①J21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283400 号

出版人 赵剑英

责任编辑 宫京蕾

特约编辑 大 乔

责任校对 闫 萍

责任印制 何 艳

出 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网 址 <http://www.csspw.cn>
发 行 部 010 - 84083685
门 市 部 010 - 84029450
经 销 新华书店及其他书店

印刷装订 北京市兴怀印刷厂
版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10 × 1000 1/16
印 张 26
插 页 2
字 数 376 千字
定 价 95.00 元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营销中心联系调换

电话：010 - 84083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出版由江西省高校高水平学科（社会学）经费资助
并获江西省 2011“客家文化传承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经费资助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13YJA850015）

课题负责人：万建中

课题组成员：邵卉芳、代改珍

《客家与民俗研究丛书》

编辑委员会

顾问：朝戈金 孙弘安 叶涛

主任：曾志刚

副主任：余 悅

编委会委员：胡龙华 曾泽鑫 陈 勃

陈春生 邱小云 吴剑波

幸跃凌 谢 康 钟俊昆

朱钦胜 李晓方 魏 炜

刘 权 钟昌火 邹春生

王天鹏 黄清喜 朱忠飞

徐赣丽

总序一

俗话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学术界也有一种现象，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学问和学者。譬如，蒙古族养育出了江格尔学和一批江格尔学的学者，藏民族养育出了格萨尔学和格萨尔的一批研究者，彝族养育出了彝学和一批彝学学者，这种学术境况极为普遍。在我国 56 个民族中，55 个少数民族的学者在从事本民族历史文化的研究中，或多或少带有族群的情结。族群身份定位常常决定着少数民族学者的学术面貌和课题指向，这基于不同的民族文化具有不同的学术理念和研究视域。同样，在客家人聚居区，形成了客家学，一批客籍客家学者脱颖而出，以其独特的学术风貌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的学术舞台。

赣南师范学院地处客家祖祖辈辈生活的中心，研究客家可谓近水楼台，得天独厚，自然成为客家学研究的一个重镇。民俗学学科能够成为江西省“重中之重”学科，与客家研究的优势环境不无关联。而且在这个学科点，不断涌现出客家学学术才俊。这套丛书中《文化传播视野下的客家民间信仰研究》的作者邹春生，《县志编纂与地方社会：明清〈瑞金县志〉研究》的作者李晓方，《客家孝道的历史人类学研究》的作者王天鹏，《闽西南“福佬客”与明清国家：平和九峰与诏安二都比较研究》的作者朱忠飞都十分年轻，他们作为客家的后代，将客家人的血脉情缘与学术造诣结合起来，承继和发扬了客家学一贯的学术传统，是客家学的未来和希望。

客家既是一个族群概念，也是一个开放性的学术门类，为学术研究提供了无限广阔的视域，每位客家学学者都能从中获取属于自己的一亩三分地。诸如林晓平的客家文化研究、邹春生客家民间信仰、王天鹏的客家孝道、朱忠飞的客家社会制度、李晓方的客家地方方志

等，他们皆经营着自己独特的学术领地。他们以富有情感和前沿意识的学术实践，不断推动客家研究向前发展。

《客家与民俗》丛书中 5 部属于客家方面的著述，作者的客籍身份为其客家研究建立了立场保障，也让研究有了身份优势，诸如局内人、自我和主位立场等。这 5 部著述资料之详实，论据之充分，定位之明确，探究之执着，唯有身为客家的学者方能达至这等学术境界。人类学强调异文化的研究，这其实是西方中心主义标榜的学术准则，因为其考察的地域只能选择第三世界国家。而中国则是民俗学研究的乐园，家乡民俗学更能体现中国民俗学的学科特点。客籍学者大多生长于客家生活领地，熟悉客家的方言和文化传统，能够用主位的立场理解和叙述一个地方的客家历史与现实。方言、生活方式、性格特征和思维习惯等无不浸润了客家传统，客籍学者的学术研究自然充溢着旺盛的思想活力，自觉地将客家身份转化为学术动机。5 部专著选题不一，学术追求各有侧重，但客家身份的学术意识均极为鲜明和突出。这是我读后的最为强烈的感受。

立足客家，面向民俗研究的其他更为广阔的领域，这是丛书《客家与民俗》编纂的基本方针。另外 5 部书是余悦的《民俗研究的多重文化审视》、徐赣丽《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来自田野的民俗学研究》、钟俊昆的《韩国民俗生活的散文式书写》、黄清喜的《南丰石邮摊文化研究》、万建中的《民间年画的技艺表现与民俗志书写——以朱仙镇为调查点》，它们似乎与客家没有关联，但据我所知，这 5 本书的作者也都为江西籍，且或多或少与客家有联系，然而，赣南师范学院民俗学学科点的教师和特聘教师不可能所有的研究都局限在客家的范围内，否则，学科点学者的视域就相对逼仄，难以在更为宽广的平台形成学术对话。客家研究大都在客家圈内展开，出现了学术自我消化的局面，其影响主要在客家学术圈内。丛书的选题不拘泥于客家，大概是出于这方面的考虑。

相对于前 5 部书的学术“专一”，后 5 部书大多采取了“扇面”的多向度的学术结构：一是涉及方方面面的民俗领域，点多而面广，尽管书名及研究对象不一致，但大都采用的是“多重文化审视”的

维度；一是研究方法和手段更为多样，有田野案例的解读、三重证据与多重文化的民俗学研究、民俗志书写范式的尝试、傩文化民间记忆的重现等，学术追求更为前沿和深刻。如果说，前5部专著以题材的地域性特色和资料之扎实见长的话，后5部则是以研究手段和角度之丰富体现出学术品格。不过，在方法论层面，这十部书具有明显的相通之处，即都是运用历史主义的方法观照传统民俗，在历史与民俗契合点上生寻求学术意义和理论归属。

总体而言，这十部专著展示了赣南师范学院民俗学学科的整体实力，是近几年来学科学术研究成效的一次全面的检验。可以肯定，这套丛书的面世，将有助于扩大赣南师范学院民俗学学科点在全国的影响。祝愿学科点在民俗学理论和实践方面都取得更大的成绩。

朝戈金

2015年10月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博士生导师，国际哲学与人文科学理事会（CIPSH）主席、中国民俗学会会长）

总序二

客家（英文：Hakka）是我国汉族的一支民系，它是在大约宋元时期，由中原汉族南迁的民众与当地土著相融合而形成。该民系的发祥地与主要聚居区是赣闽粤毗邻地区，其居民播迁至世界各地。

从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至今，客家研究出现了如火如荼的局面，俨然成为了一门“显学”。与此同时，对客家研究利弊得失的反思也在进行，其中一个引起许多学者思索的问题是：客家作为一个汉族的大民系，研究的内容似乎可以包罗万象，但，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什么？这个问题也许永远没有标准答案——还是应了中国的一句老话：“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可以很坦然地提出我们认为的重点，这就是客家民俗文化。

我们关注客家民俗文化，不仅是因为它的丰富性，还因为它的特色鲜明，阿娜多姿，同时，它保持得相对比较完整，且有着大量“原生态”的“事象”。

《客家与民俗》丛书共10本，内容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以客家民俗文化为主要研究对象，涉及客家民间信仰、客家孝道、客家茶文化、客家宗族文化、客家方志的编撰书写，等等。第二部分的内容包括乡村民俗、韩国民俗、傩文化、福佬客文化、民俗问题的多重文化审视、先秦要籍的民俗学解读，等等。这部分的主要内容是更大视域下的民俗文化，它与第一部分客家文化有着内在的逻辑关系：

从纵的方向视之，探索了客家民俗文化的源流。客家民俗文化之源在何处？与中国传统文化关系怎样？是一个引起争论的问题。丛书对先秦诸子著作以及《周易》中所描述的民俗事象、民俗文化以及民俗思想进行了解读和探析，这就能使人们更深刻地认识到，客家民俗文化之源在于中国传统文化，也佐证了所谓客家文化“根在中原”

的观点。从横的方向视之，在民俗文化方面具有文化比较研究的意义。例如，客家傩文化是非常丰富的，而南丰傩其实与客家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丛书中对南丰傩文化的研究可作为客家傩文化研究的延伸；对于福佬客文化的论述，本身就是一种客家文化与其它民系文化比较研究的绝佳视角；韩国文化与中国文化有着非常紧密的关系，丛书中对其民俗文化的描述及研究，是从更广阔的视野为中国文化包括客家文化的研究提供一种比较及参照；《民俗问题的多重文化审视》、《文化遗产在当代中国》等著作都从一个开阔的视野来探讨民俗文化，这对于客家民俗文化的研究有着一定的启迪意义。

希望这部前后历时 6 年的丛书，能对民俗文化尤其是客家民俗文化的研究起着一定的推进作用。

本丛书在编著、出版过程中得到赣南师范学院校党政领导以及学科处、社会科学处等部门的支持和指导，江西省社会学“高水平学科”给予了经费上的资助，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民族文学研究所所长、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研究员亲自为本丛书作序，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宫京蕾副编审不辞劳苦，多次与作者交谈并进行指导，为丛书的顺利出版耗费了大量的心血，在此一并表示衷心的感谢。

编 者

2015 年 10 月

前　　言

朱仙镇木版年画原称“门神”或“码子”，外地商人称“花货”，源于汉唐壁画艺术，由“桃符”演变而来，为中国木版年画源头，始于唐，兴于宋，鼎盛于明、清，具有浓厚的民间艺术特色，是中国木版年画之鼻祖。朱仙镇木版年画传承至今，已被国际友人誉为中华国宝。朱仙镇木版年画风格独特，用色讲究，构图饱满匀称，线条粗犷简练，形象生动，造型古朴夸张，色彩艳丽，取材广泛，年画题材和塑造的人物多源于脍炙人口的民间故事、神话传说和戏曲人物等，在历史发展的长河中承载着“成人伦、助教化”的社会功能。

朱仙镇木版年画以鲜明的风格、独特的形式和精湛的技法被举世公认。她是华夏民族智慧的结晶、民族文化的一枝奇葩，素有“民间艺术百科全书”之称，这一古老的民间艺术以独有的艺术魅力、精湛的雕刻技法和历史地位被国际友人和国内年画专家视为“中华弥珍瑰宝”。朱仙镇木版年画作为优秀的民间艺术奇葩，20世纪30年代被日本出版的《世界美术全集》收录，19幅民国前的年画作品被北京、上海鲁迅纪念馆和刘岘纪念馆收藏，多幅年画作品被法国、加拿大、英国、缅甸、俄罗斯、日本等国家博物馆收藏，2002年被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列入文化遗产抢救保护工程。2006年首批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一　关于选题

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语境中，民间年画得到了高度关注，但目前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年画产品方面，很少对民间年画工艺的操作过程进行全方位的调查与研究。尽管我国文化研究者一直有着研究物质文化

的传统，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关注并不多，虽有过民俗学、民族学的一些讨论，但这一讨论或是站在民俗学的立场对这场非遗运动进行反思，鲜有从微观层面结合具体个案的思考。当然，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由于各种原因，我国大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文献材料中鲜有记载，即便在当代，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开展也远远落后于韩国、日本等诸多国家，在法律和制度建设上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在具体的保护过程中也存在着一定的问题，仅仅停留在“为什么要保护”的层面，缺少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资料挖掘整理的研究。随着现代化速度的加快，民间技艺正在迅速地远离我们的生活和视线，大量的民间技艺资料正在失去记忆。作为民族民间文化抢救工程的一个有机部分，本书具有深远的现实意义。

传统技艺是民间最主要的生存方式之一，是人们赖以生存的最基本的知识和手段，也是最重要的地方传统。年画技艺属于“手工业生产常识”，这是一个手工社区正常的人所具有的、可以用以维持社会地位和生存状态的知识或信念，一般具有普遍性、直观性、实践性、实用性和易模仿等特点。这些特点可以归结到一个平常的词，就是“平常”。在现代社会学领域，由常识和日常生活构成的世界，被认为是最高的实在。在国内民俗学界，学者们热衷于“非常”世界的经营，即爱好对“节日”时段的解释，而面对漫长的非节日时段却熟视无睹，觉得无须解释抑或无力解释。长期以来，传统技艺作为人们习以为常也理所当然的“平常的事实”，自然就被学术实践忽视掉了。

以年画遗产为突破口，是一个非常务实的研究思路，因为民间年画作为一种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可以具体观察和进行体验的，这就为技艺资料的描述和呈现提供了便利，而且民间工艺的核心就是技艺。就目前而言，对传统民间技艺保护的重中之重就是发掘和整理资料，避免资料的大量流失，将文献的、口传的、行为的以及图案符号的各种静态和活态的文化遗存，通过各种有效手段保存下来，为研究奠定坚实的基础。

探讨年画遗产发掘和保护策略，需要有强有力的个案为支撑，否

则就可能流于空洞。另外，个案如果太分散，门类不一致，调查和研究的注意力不能集中，同样难以达到预期目标。之所以选择民间年画作为课题考察的目标，主要是出于四方面的考虑：一是年画的制作技艺仍处于比较完整的活态状态，民间老艺人仍健在，为现场调查提供了优越的条件，可以有效地完成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二是年画资料的发掘、整理工作有了一定的基础，可以考察已有工作的经验和不足，进一步探寻发掘、整理的有效途径。三是朱仙镇年画流派众多，各自技艺特色突出，这就为探究民间技艺发掘、保存的复杂性和多种可能性提供了条件，可以在相互对照和比较中获得更加有效的资料发掘和整理的途径和方法。四是朱仙镇年画的制作工艺比较复杂，工序烦琐，所涉及的面比较宽，诸如美术、文学、雕刻、印刷、印染、装裱等，在民间工艺方面更具代表性和典型性。因此，本书选择河南朱仙镇为个案，通过对技艺资料的整理和挖掘研究，一方面对其技艺资料的传承做一个动态的观照过程，厘清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存在的问题，为民间年画遗产的发掘和整理工作提供普遍性的原理和操作范式；另一方面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具体措施的落实和开展提供理论参考。

河南朱仙镇是传统文化丰厚的区域，作为我国历史文化名镇，文化积淀相当深厚，众多民间传统仍然存在于地方民众的日常生活之中，年画是当地民众生活中的一个“标志性文化”。经过几百年来的发展，朱仙镇积累了大量的民间年画技艺传承资料，并已进入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民间年画的制作技艺更是有了新的突破。因此，选择民间年画作为个案，既是基于其悠久的历史传统，累积了充足的历史传承资料，同时也能对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保护策略进行思考。

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起步较晚，虽然取得了诸如“十套集成”等相关研究成果，但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和实践方面仍存在较大的不足。

首先表现在理论研究的相对滞后。众多理论研究成果主题狭窄，多是停留在对其概念的论述上，或是立足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身，对其

概念的内涵和外延进行分析；或是与其他国家进行比较，探讨保护的多种理念；或是立足于本国立场，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类别进行思考。值得一提的是，在反思非物质文化遗产这一概念的同时，不少学者还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性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对其特性进行了重新的界定，开始强调注重非物质文化遗产中的“活态保护”，同时也有学者提出了“非物质性还是身体性”这一命题，深化了对非物质文化遗产本质的理解。但这些探讨都不是建立在扎实的田野调查的基础上，大多是从概念到概念，理论与实践严重脱节。诸多研究成果仅是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所提出的“记忆工程”和“活态保护”的再写，缺少相应的具体实例的论述。就目前而言，理论研究的不足导致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仅仅停留在了申报这一阶段，而申报成功之后具体保护措施的制定与落实仍是一片空白，形成了重申报轻保护的不利局面。

本书拟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之上，选择具体实例，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中的保护措施进行研究，并落实到传统技艺资料的发掘整理之上。本书选择年画为个案，一方面是基于此项工艺在这些文化名镇具有悠久的历史，积累了技艺传承的大量材料，至今仍处于活跃状态；另一方面，该项工艺已成功申报成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在具体保护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经验。尽管诸如朱仙镇木版年画一直以来也是民俗学研究的重点，出现了大量以其为研究对象的研究成果。以2002年首届中国木版年画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开封论艺》为例，尽管论文集中了冯骥才、王树村、薄松年、张道一、张振犁等一批学者的中国传统木版年画的研究成果，但大部分成果将目光聚焦于木版年画的工艺知识这一视域，停留在年画作为普通艺术文本的研究上，并多为一般性的描述，缺少深入的学理分析，缺少对其文化内涵的深入研究。值得一提的是，众多关于年画的研究成果主要关注的是年画的题材内涵及社会功能方面，停留于年画作品本身，并没有考察其制作技艺、技艺的表现形态以及这一技艺的历史演变过程和生存状况、技艺生存的各种人文背景，也没有对其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目录中的技艺资料的发掘过程进行关注，使当逐年画的研究一直处于

单一化和平面化的状态，未能真正揭示年画广阔现实意义和深厚的文化魅力。总体而言，我国木版年画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与我国木版年画资源的深厚与丰富极不相称。

本书选择朱仙镇年画为个案，立足于扎实的田野调查和细致的文献搜集，对其生产方式、工艺流程、技艺资料、相关的口头传统、历史积淀及其现有的保护措施、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过程进行全方位考察，这样一种学术定位，不仅能够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相应的经验，改变当前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仅停留于理论探讨层面，而缺少具体方法论的现状，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理论水平和实践层次，更能全面深入发掘民间工艺传统的文化资源，并对这一文化资源进行归类整理，获得更有效的保护，进而深化民间年画的现实意义。两者互为补充，相得益彰。

二　主要目标

本书包括两部分任务。一是案头研究。搜集有关民间年画的所有文献资料及其他记录资料，进行归类编目和分析，包括全面地梳理国外民间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历史与现状，同时探讨年画这一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工作已取得的进展，旨在廓清和构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技艺资料挖掘研究的基本理论框架、思路和具体手段。

二是开展长期的田野调查。以朱仙镇年画为调查对象，深入现场，通过记录、制图、摄像、录影和录音等多种手段，全方位有步骤、有条理地调查、搜集活态的生产和操作技艺资料，对个案中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统技艺资料进行挖掘、整理、研究，探讨民间技艺发掘和整理的普遍原理和有效范式，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提供实践性经验。

充分考虑到民间年画制作技艺的特殊性和发掘、整理、分析的有效性，以上两个部分的任务具体分解为下面四个方面的工作方案：

1. 年画艺人的口述史和制作群体

主要以年画的制作群体为考察对象，口头传统是技艺资料传承的重要途径，通过对老艺人们口述史包括个人生活史、家族史的记录和叙事的考察，对年画制作工艺的传承群体进行分析，把握传承年画制作技艺这一群体的结构形态，进而探究年画技艺是如何在代际之间、家族内部以及不同区域中得到传播的，构建年画传统的传承机制。

2. 年画制作工艺与习俗

对朱仙镇木版年画的制作流程、步骤、技法、原料、时空要求等为考察对象，完整复原一幅年画制作的整个过程。通过对历史文献考察与实地调查，对其年画制作的工艺与习俗变迁进行分析。

3. 年画题材与技艺表现

立足于田野调查的实际情况，讨论年画题材内容与表现技艺之间的关系。年画叙事风格与种类，如何通过技艺表现完成叙事。其实，年画叙事本身就是技艺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如何叙事就是年画的技艺。对当过年画的题材内容进行考察，同时通过对传承人的深度访谈，对不同题材的处理形式予以分析。

4. 年画申遗与保护的运作程序

以朱仙镇年画的申遗过程为考察对象，对其在申遗过程中技艺资料的整理进行全面研究，探讨现有技艺资料发掘和整理方式方法的得与失；同时也将其在申遗之后的保护措施进行分析，评析技艺保护措施的实施情况。对朱仙镇年画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之后的资料挖掘整理状况进行分析，对其进入非物质文化遗产目录之后的技艺资料的挖掘整理进行研究，从实践层面上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措施进行反思，从而赋予传统技艺研究的现实意义。

这四个方面立足于民间年画技艺表现形态的特点，从时间和空间两个维度上，兼顾和涵盖了民间年画技艺展示的不同侧面，涉及朱仙镇木版年画技艺的方方面面，贯穿年画技艺的历史与现实，空间与时间相互交错，为发掘年画的所有资料提供了可能性和所侧重的工作目标，也为年画技艺发掘和整理的不同范式的比较预留了广阔的空间。力求从不同角度，将朱仙镇年画遗产家底全部发掘出来，提供一份在

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最完整最有说服力的田野作业报告。旨在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田野作业提供一个综合性的实践范例。这超越了仅仅是搜集和单纯记录的层次，是对年画技艺遗产进行专题调查和研究，探索保存和利用传统民间工艺资料的方式和各种可行性的策略，即解决如何发掘和整理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料的问题，也是对年画遗产进行民俗志的专题性书写，探索保存和利用传统民间工艺资料的方式和各种可行性的策略，即解决如何挖掘、整理和呈现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问题，以期提升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和实践水平，以及深化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理论研究。

另外，民间技艺资料不是死的而是活的，有着相当复杂的关系，需要有义明确的操作方案。民间技艺是当地人活下去的生存手段和表达感情、思想的方式，是有生命、有感情的，需要搜集者去感悟和体验。倘若仅仅就是为了资料，就很难真正理解这些资料。以上四个方面专题的设立，正是体现了民间技艺的人文主义色彩，可以从不同的侧面理解当地人对待年画技艺的情感、态度和价值观。这就超越了单纯的传统技艺资料的发掘与整理。

三　研究方法

本书以河南朱仙镇为个案，立足于田野调查，从年画艺人的口述史和制作群体、年画制作工艺与习俗、年画题材与技艺表现、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年画申请与保护的运作程序四个方面，全面而又深入发掘和整理年画遗存尤其是技艺资料，并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中传统技艺资料的挖掘整理过程和具体方法进行研究，既从历时的角度立足于文献材料对其技艺资料的整理进行关注，也通过分析其申报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材料对其申报过程中的资料整理方式予以关注，并将口头传统纳入遗产资料整理和民俗志书写中来。

将采取文献理论探讨与田野调查结合的办法，在不同阶段、问题上各有侧重，既注重文献研究的全面深入，又强调在田野中联系实际、发现问题，保持田野和理论良好互动，互有生发。